

疏解乡村情感治理现实困境的优化对策

汤雅妮

(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是面向国家总体治理布局的一个微观缩影, 现代化既融合传统文化底蕴也承载了诸多社会人文情愫。情感治理是一种依托宣传指引、行为感化以及意识形态一统融合等软性教化的手段, 是对公共管理领域治理方式方法的创造性改革与创新性实践。基于此, 本文旨在构建“三级联动”的乡村基层组织体系, 以组织化的形式重建新型农村社区, 为现阶段的情感治理提供完备的系统保障。各级治理主体明晰自身职能定位, 理顺权责关系, 在村社内部形成充满凝聚力以及向心力的情感内核, 为构筑乡村情感治理有机体发挥内生性动力。

【关键词】乡村治理; 情感治理; 多元共治; 乡村治理共同体

一、引言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面向的一个重要维度, 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创造力、构建“人人享有、人人尽责”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未来我们需要发力的关键点, 也为打造中国式乡村治理的文明典范指明出路。乡村振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提出来的命题, 实现“农村美、农民富、农业旺、农风淳”这一美好愿景, 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现如今制度框架之外“情”的生成与基层社会中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 依托情感治理可以更好地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

当前学者对情感治理的研究现状大致基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以社会心理学、传统文化观念的视角解析何为情感。美国学者玛莎·纳斯鲍姆从哲学高度界定情感功能, 她认为好情感能使个人由自利过渡到利他, “认同更普遍的善”。^[1]其次, 以陈桂生学者为代表, 阐述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新面向, 取得了柔性治理、情感回归、情感重塑以及“治理有效”的实践成果^[2], 情感治理推进了村级治理的有效性, 情感策略的运用凸显了乡村治理的转型价值。最后, 视情感为一种柔性治理机制, 是对信息时代数目字治理以及刚性规则之治的有机补充^[3], 而不是替代。

二、何谓情感治理及其必要性

乡村情感治理是一种与制度化、科层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治理相对应的创新型和包容性治理方式^[4], 以民风淳厚的乡土场域为载体, 坚持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 确立并强化村民的主体人格。乡情之治似如流水, 她无远弗届、攻无不克、无所不包。往往以一种温柔的渗透方式达到刚性治理难以达到的效果。^[5]总而言之, 情感治理是对理性治理范式的创新性研究, 是面对当前基层治理碎片化、分散化等突出乱象, 重

建乡村“熟人社会”, 找回归属感与家乡认同感的关键“密钥”。

在情感治理必要性方面, 首先, 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人民群众享有主体地位。人是感性动物, 具备情感作用的天赋特质, 有情感生化、培植等心理需求。其次, 情感治理是对现有治理方式的有机补充。情感治理并不排斥制度和机制的运用与保障, 恰恰情感治理本身就是体系、制度和机制的统一体^[6]。最后, 多元化概念构建。构建以柔克刚的逆向思维模式, 运用“以情治情、以规治情”^[7]的工作机制协调、处理基层事务的利益纠纷, 治理方式多元化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基层社会。

三、“三级联动”社会体系: 乡村情感治理的实施路径

情感治理的首要面向是基层社会的稳定, 这是所有受任于治理模式下行为逻辑的前提条件。第一, 积极的情感培育缓和了基层社会中难以弥合的矛盾纠纷, 通过心理疏导调解负面情绪, 化恩怨变邻里友谊。第二, 持续情感互动构建和睦的党群、干群关系, 形成紧密的社会人际关系, 社会秩序融洽和谐。乡村情感治理秉承善治原则, 善治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的最终目的, 也是逻辑终点。着眼于生动写实且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 就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下, 建立健全乡村基层组织体系, 目标在于多方共治, 整合社会资源, 形成乡村情感治理共同体。

基层情感治理是“融情于景, 借情共治”的动态协作过程, 基层治理重在“治人”, 更在民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本文依据“情感——行为”双向互动机制作为文章脉络串联的起始。它“聚焦、描绘、细化实践中的情感再造过程, 考察运作逻辑并进行动态阐述。”一方面是以情治情, 化情为动。情感资源充

分补给,断绝借情宣泄的情感异化,引导形成“理性的”情感态度。另一方面是以动促情,也就是活动参与和切身体验又反作用于情感,这种反作用是一种积极正向的“情感回馈”。

(一) 党建引领,情感治理之领导统筹

就乡村治理而言,其在基层具体实践中形成了诸多治理经验,第一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率先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简约高效的组织领导体系,使得基层党组织阵地的触角延伸至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整合现有资源实现精准匹配,同时号召、组织、协调、团结各方力量,凝聚民心,提升基层党组织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和认可度。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全方位领导村级组织科学有效运作的战斗堡垒,应将党的力量、思想和理念全面地渗透到农村基层的有形实体,农村基层组织涵盖了党在农村的全部工作。

党的全面领导为村庄治理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的发展目标、有效的组织动员、充分的资源保障、温暖的人文关怀、妥善的利益协调和先进的榜样示范。^[8]今后,要更加凸显党建引领下其情感治理作用发挥的承载机制,在理论上解读和实践中培育村民的参与能动性,使分散的村民自我组织自我行动起来。^[9]运用情感策略疏通基层场域的堵点、痛点、难点等问题,构建“强组织的低成本撬动”机制,焕活自治细胞,为乡村场域人民本位的村级主体建设提供更多承载力和现实保障,真真切切让当家做主的村民享有获得感、幸福感与自我实现感。

(二) 构筑“内外联合”的乡村基层组织体系

1. 内核力量充分调动

(1) 村民委员会:组织基础与工作轴心。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造福于民的工作也永无止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把“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始终把群众需要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首选。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特殊在于自治性,着眼于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的价值基石,是贯彻落实民本思想的具体组织表征,更是基层民主在乡村场域的实然显现。

作为村级组织的基础和轴心,村委会在情感治理中的功能更多体现在引导、动员与协调这三个维度。在多方的信息动员与情感治理细腻微观的技艺方式下,村民逐渐对乡村公共事务有了热情,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成为村级自我管理的核心细胞。^[10]与此同时,村委会的带动促使乡村各职能主体协同发力,为进一步策划公共活动、组织搭建平台集思广益。

(2) 村民自治组织下设的决策机构。从社会宏观背景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协商民主才真正成为发展基层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标志。^[11]以村民小组、村民(代表)大会、村集体议事会、理事会等

为典型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下设的决策机构,是基层民主充分体现的应有内涵,保障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四大民主权益,决策权、知情权、表决权与监督权。

“基层决策人民参,村级事务人民议,村民自治人民来。”重返情感价值维度,可以察觉,受益于基层表达、沟通渠道畅通的民主协商机制的有效落实,村民的主体人格得到尊重与重视,在民主活动参与中建言献策,逐渐意识到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更是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人”对责任与权力的认可和践行,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挖掘自身潜能,逐步形成自我价值满足的愉悦感和参与的成就感。

2. 外源势能全面发挥

(1) 社会(公益性)组织:接应治理任务,细化民生多面需求。从乡村治理方式创新的逻辑思路展开,现阶段的治理文明是单一管理与多元治理的统筹,这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长期陷于控制与管理的被动情形。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冲突矛盾化解、文明乡风构建等多个层面实现了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有为和能动性创造。因而,外部社会力量在乡村情感治理中发挥着中坚之力,切实做大民生领域的这块蛋糕,保障人民生活美满和谐、安康富足。

由此来看,需要我们盘活外部主体的治理行为,搜集那些民间发育成熟、规模效益较好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来承接政府部分职能,演绎其多面化、多样性、专业性的组织特质,不仅实现了村民多样化生活诉求的满足与情感关切,通过集体仪式活动表达乡村传统文化的方式,感召村民形成对家乡的归属感和深切眷恋,再次激发村民对公共价值理念和社会共同体的深刻认识。

(2) 基层志愿服务型组织:盘活志愿服务行动,传播人间大爱无私。乡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封闭性的空间格局,为集体行动生活创造了个人利己行为与公共行动以及个人本位主义与公共价值精神的有机统合。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具有归属感的村落共同体亦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有公共场所和聚会空间,能够产生公共舆论,并能形成集体行动^[12]。志愿服务型组织以潜在的人格化特质和非个人私欲为行动准则,是一种倡导公共情感价值和公共情怀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志愿服务型组织不管在机构设置、组织行动导向还是制度安排上都与情感治理的具体表征相契合,在普遍共有的公共情怀与行为动机下,志愿活动物理空间的建立为公共舆论的碰撞提供了关键时间节点,它们作为无私欲、无私利的基层社会公益性组织在村民群众的邻里家常和日常生活中借机从某个微妙的细节入手,营造出“乡邻共庆、集体共情”的乡土氛围。

比如以传统文化节日为契机走访村户，进行民生关切的“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在深入的情感交流中带动村民关注家乡发展，共同商议乡村未来的规划与建设，为村民追求幸福生活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表达渠道。

（三）赋权于民：村民群众主体性身份定格

深入理论，扎根实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基层治理有效”专题教育培训中所重点强调的内容。面向广大的基层群体，农民群众在基层社会维稳与整治工作中更具发言权，他们的切身经历与感受为我们后续治理工作的展开与完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基层民主协商机制是保障民主权力的应然举措，不仅提高了决策效率也再次证实了“表达——反馈”渠道的应用成效，从决策讨论、集体表决到方案制定再到最终审议结果的公布，每个环节无不流露出对村民人格身份的尊重，更是村民从被动接受治理的边缘化群体到村级治理主人翁地位的突破式转变，是基层情感治理转型的主体实践。

强化村级治理的主体性建设，以人为本的治理逻辑要求我们重视底层群众的心声以及所想所思，基层治理无非就是要解决社会民生领域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切身利益问题，因而村民才是乡村治理实践的主体，只不过他们将其手中的权力转移，并将其赋予更有治理权威和行政话语权的基层政权组织以及相关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因此，他们更要心系百姓，造福于民，努力践行“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工作标准与行为典范。

四、中国式情感治理的总结与反思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奋力书写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基层治理最终落脚点还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与满意感，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情感治理有机体，促进乡村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幸福美满。

天下为安，国泰祥和在民心，治国理政是为了让更多人民百姓在谋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有出路，有奔头，有底气。在中国构建基层社会和谐的实践中，情感治理正是通过管理对象的自觉自愿来实现公共管理目标，属于顺心施治而非逆心施治，由此在行为规范和行动导向两个方面施加影响。正如总书记指出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

结语

将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议程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布局中绝非易事，而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的工程。不同于西方文明对情感的相对抑制，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着情感本位的文化，民众倾向于从情感出发去理解个人生活和治理秩序；从比较的维度来看，重视情感状态成为中国治理的优势。情感治理不仅具有脉络相连的历史传承性，也具有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理论自洽性和实践契合性。由此，打造了中国式本土化乡村情感治理的实践典范。

参考文献：

- [1] 邓凯文. 情感何以影响社会稳定——玛莎·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J]. 理论与现代化, 2016 (06): 90-94.
- [2] 陈桂生, 吴合庆. 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J]. 求实, 2022 (04): 96-108+112.
- [3] 罗敏.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J]. 求实, 2020, No.456 (04): 41-55+110.
- [4] 康芳. 空间、文化和制度：乡村柔性治理的三维检视[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 (03): 120-128.
- [5] 赵秀玲. 中国基层治理研究转向及其思考[J]. 东南学术, 2022 (06): 98-106+248.
- [6] 罗强强, 杨茹. 寓情于理：基层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J]. 江淮论坛, 2022 (05): 158-164.
- [7] 刘太刚, 向昉. “以规治情”与“以情治情”：社区情感治理的再认识[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 (06): 11-18.
- [8] 龚维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J]. 中国国情国力, 2023 (04): 10-11.
- [9] 苑丰, 金太军. 行政、社区、市场：乡村组织振兴“三重赋权”的内在逻辑[J]. 理论与改革, 2021 (04): 102-115.
- [10] 李晟赞, 罗强强. 党建引领型志愿服务激发社区自治活力何以可能——基于兰州市M社区“共享集市”个案考察[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4 (04): 58-67.
- [11] 任中平.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J]. 理论与改革, 2022 (02): 1-15+147.
- [12] 毛丹, 任强. 中国农村公共领域的生长：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村民自治诸问题[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作者简介：

汤雅妮(1999.04)，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大学本科，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基层社会治理。